

金融

JINRONG
SHI YIZHONG DANDANG

是一种担当

——论道金融热点话题

LUNDAO JINRONG REDIAN HUATI

董玉华 编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金融

JINRONG
SHI YIZHONG DANDANG

是一种担当

——论道金融热点话题

LUNDAO JINRONG REDIAN HUATI

董玉华 编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融是一种担当——论道金融热点话题 / 董玉华编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141 - 2506 - 1

I. ①金… II. ①董… III. ①金融机构 - 研究 - 中国
IV. ①F832.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5011 号

责任编辑: 周国强
责任校对: 徐领弟 刘 昕
责任印制: 邱 天

金融是一种担当

——论道金融热点话题

董玉华 编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编辑部电话: 88191350 发行部电话: 88191537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29 印张 550000 字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2506 - 1 定价: 7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金融机构要勇于承担服务“三农” 和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亚洲金融危机，曾对亚洲乃至全球经济给予重大打击；始于2007年8月的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已经发展成为一场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它不仅重创了美国金融与经济，无疑也给全球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使国际金融体系遭受到“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冲击与考验，同时也逆转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加速了世界经济的下滑；欧洲债务危机从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开始，向欧元区核心国家蔓延，引发全球对再次爆发金融危机的忧虑，德、法等国不得不牵头建立欧洲稳定基金，以挽救欧元区经济……这些都是世界重大的金融问题。

金融具有脆弱性和传染性，这就需要特别关注金融的发展与稳定，在应对世界金融问题的同时，夯实我国自身的经济金融基础。

中国的银行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重视资本约束对银行监管的作用；股份制银行及地方性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呈现健康发展之势；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也发展迅速，增强了服务“三农”与中小企业的力量。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银行业在服务国民经济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三农”经济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但由于缺少抵押品以及“三农”经济天然存在的自然风险，一些大型商业银行、中小股份制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对“三农”经济涉足较少。涉农的商业银行，由于其风险控制及赢利要求，也不愿意将资源大比例配置到涉农的企业和农民，甚至出现许多乡镇金融服务空白。还有中小企业融资难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所以，亟须加强对“三农”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问题的研究。

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三农”问题。从2004年至2012年中央连续九年下发一号文件，加大支持“三农”的力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贯穿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基本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对于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人民政权的巩固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知道，小微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力量，是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促进就业、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我们也要看到，因为小微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小，具有一定的脆弱性，更加需要政策扶持。2012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在加大财税支持、推动创新发展、支持开拓市场、提高管理水平、促进集聚发展、加强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特别就金融支持小型微型企业，缓解小型微型企业融资困难提出明确要求。

本书将金融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定义为一种社会责任，提出金融是一种担当的新命题，具有新意。

同时，围绕民间借贷、金融创新、国有银行改革以及发挥金融的优化资源配置、调节经济结构的功能等经济金融热点问题，作者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

董玉华同志是中国农业银行内蒙古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经济学博士，是美国伊利诺依大学（香槟）高级访问学者。曾在世界银行、美联银行、瑞士银行和日本东海银行工作学习过。曾任教于江西财经大学，先后在中国农业

银行总行、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工作。著有《超越干预与自我超越——国有商业银行生存的逻辑与矛盾的内生性分析》等专著。

董玉华同志理论功底深厚，又有工作实践。他本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呼吁金融机构加大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力度；加强对民间借贷规范和监管，使民间借贷阳光化操作，成为我国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成为服务“三农”及中小企业的重要力量；呼吁银行要积极支持“节能减排”项目，开展绿色信贷等。我认为，把银行业既看成追求利润的企业，又看成担当社会责任的组织，体现了较高的境界，提升了金融的层次。

希望董玉华同志继续就加强“三农”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等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

布小林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

代序一

中国房地产难题有解

房地产市场遭遇的许多问题都源于它在地方政府财政中的作用。要控制房价，房地产开发必须从“土地银行模式”向“工厂模式”转型。政府需要鼓励开发速度和规模，并引入融资工具来支持“工厂模式。”

房地产开发须转型

中国的房地产已经迅速成长为一个巨大产业。200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已经占到了GDP的10%；由于其增长快于GDP增长，因此这一份额还将继续上升。

中国房地产业虽然庞大，但缺少好的制度基础，也没有整合到一个深思熟虑的城市化战略中去。它主要被用来为城市化筹集资金。房地产市场目前遭遇的许多问题（例如高房价，对外资和灰色收入需求的过度依赖等）都源于它在地方政府财政中的作用。中国必须实施整体性的城市化战略，为房地产市场提供一个稳定的“锚”。

中国地方政府不能举债。当然，通过其拥有的企业，许多地方政府还是已

经有了很多借贷。但无论如何，缺乏直接融资渠道，是地方政府希望最大化房价从而最大化其城市建设筹资能力的主要原因。如果地方政府能以其未来财政收入发行债券，那么它的激励将会变成最大化长期收入，这与最大化当前收入有着显著区别。

当然，如果所有地方政府都被允许发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金融无序。中央政府有必要选择一些城市，让其能够获得资源。而拥有 3000 万 ~ 5000 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将会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参见《财经》2006 年第 26 期《想象 5000 万人超级城市》）。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充分的规模经济。这些城市应该享有直辖市地位，并拥有发债权。债券市场将会通过对其债券赋予不同的风险贴水，来判断它们的发展战略是否得当；中央政府则可以从债券市场的反应，知道这些城市做得是好还是坏。

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合理战略应当与城市化战略一致。目前，开发商的经营模式是大量储备土地——土地银行——并从土地未来升值中获利。显然，金融市场青睐这些企业，它们的股价高企，也能够以土地为抵押品轻易地贷到款。

但对中国的城市化战略来说，这个模式是不好的。超大城市战略需要每一次房地产开发的都是规模巨大且迅速的，从而最小化融资成本，并最大化城市建设的有效性。中国需要能够像工厂大规模制造产品那样迅速开发大片地区的开发商。

从“土地银行模式”向“工厂模式”的转变，需要对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关系进行调整。最近引入的 30% ~ 60% 的土地增值税，对于土地银行模式就是一个重要的负面激励。而在正面，政府需要对开发速度和规模加以鼓励，并引入融资工具来支持工厂模式。政府已经要求购买土地后两年内必须开发，但在现实中，这个规则很少得到执行——这是土地银行模式如此流行的原因。如果规则得到执行，它将迫使开发商转向工厂模式。

将房地产开发转为工厂模式，是房价降温的关键。在土地银行模式下，如果价格还不够高，开发商就有激励去拖延开发时间、缩小开发规模。如果价格正在上升，开发商就有动机去等待，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对此行为的唯一制约手段就是抽出银行信贷，但却很少被实施。所以，一旦货币供给走强、信贷易得，房地产价格自然就快速增长，不管市场上有多少开发商都是如此。而与此相反，工厂模式下开发商的利润率有赖于销售速度。当房价高时，供给自然就

会上升，从而冷却价格。

工厂模式需要发达的金融市场作为后盾。房地产开发的关键在于融资。而中国开发商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拿到土地和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国开发商的竞争优势是他们同政府的关系。如果中国改变政策环境，促使房地产业向工厂模式转型，现在行业中的很多佼佼者未必能保住他们今天的地位。

中国应发展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以支持房地产业的工厂模式。与此相关的最重要的金融产品，包括资产证券化（asset backed securities）、过桥贷款以及对冲地价波动的衍生品。房地产业是一个资本密集的行业，融资的成本高低对其效率至关重要。目前，房地产主要的融资渠道是股市和银行，二者的成本都很高。这种融资上的低效率只是暂时被快速上涨的房价所掩盖，一旦房价不再上涨甚至下跌，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可能会大批破产。

未来，中国的开发商可能会向两个方向分化。其中多数专注于开发位于城市中心或条件优越的郊区的高利润住宅，以及第二居所性质的住宅。另一些企业将发展为服务于大众市场的，每年开发数百万平方米房屋的大规模企业。中国市场可以容纳 20~30 个这种规模的开发商。他们的竞争优势在于管理资金，以及统筹众多的承包商。他们的规模也将大到足以开发基础设施，也就是说，他们就是城市化的代言人。他们的账面资产可达数十亿元之巨，但大部分属于债务融资，并且需要频繁地再融资。

低收入群体住房：三种模式

工厂模式将解决目前市场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在今天，住房对多数白领都还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尽管缺少来自高收入的白领阶层的需求，来自灰色收入和城市拆迁改造的需求还是推高了市场。不过，当过剩的流动性消逝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可能遭遇一场可怕的低迷，甚至可能把银行也拖下水。

不过，即使房地产改革成功，工厂模式成为主流，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比如占城市人口增长大部分的蓝领工人）仍然购置不起房产。为了推动城市化，保持城市稳定，中国可能需要特殊的措施以满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在此，有三个模式可供参考。

第一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即依靠廉价土地和廉价汽车来解决大多数人的住房需求。美国土地市场的私有产权特征最为显著，对土地用途没有严格限制。靠近城市的土地很容易变成新的城区，土地增值的收益属于原土地的主人，而不是像中国这样被政府垄断。因此，开发商总能买到便宜的土地盖房子。这就是美国房价收入比仅为3~4，为世界最低的原因所在。当然，这些新的住宅区距现有的城市中心很远。但拥有和维护汽车的成本在美国也非常低，低收入家庭可以购买远离市中心的住宅，开车一两个小时去工作。随着更多的人搬到这样的地区，他们就会形成自己的城市中心，居民也可以就近找到工作。这一进程往复进行，使城市向四周蔓延。洛杉矶是这类城市的典型。

新加坡属于第二种模式，其超过80%的居民居住在政府修建的公屋中。新加坡的公屋是指那些由负责管理住房的政府机构开发销售的房地产，这使新加坡政府成为该市最大的开发商。新加坡相当一部分土地都是政府回收的，政府回收土地的成本非常低，每平方米仅200~300美元（中国更低，只相当于新加坡的1/10）。即使容积率低到1，政府仍然可以保证其所开发项目的土地成本非常低。同时，新加坡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输入劳工，以保持较低的建筑成本。因此，新加坡可以以4~5倍家庭年收入的价格出售公屋。而且，新加坡的公屋质量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甚至比很多国家的私人住宅都好。

第三种模式在中国香港，大约半数的人口住在公屋中，其中多数是租住的。不像新加坡，香港政府兴建的公屋条件非常之差，有些简直不妨称作笼子。政府目的在于激励住在公屋中的居民尽可能努力工作，并从市场中购买昂贵的住房——其均价目前大约每平方米4.1万元人民币。香港月薪的平均数则大约在1.5万港币，中位数大约1万港币。显然，多数人是买不起房子的。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之间的巨大反差是两地政治差异的结果。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获得执政地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推行质优价廉的住房政策；如果人们买不起房子，其统治也就难以为继。而香港殖民时期政府的权力来自伦敦，没有这种不安全感。高地价可以帮助政府获得收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购买了昂贵的私有住宅，高房价的既得利益集团就会扩大。事实上，在1998年市场恐慌发生后，香港的中产阶级支持政府限量供地、恢复房价的政策。

当然，香港的稳定也要依靠居住在公屋里的那一半人口的支持。只要这些居民对未来依然怀有希望，憧憬着买得起私有住宅的一天，这个社会就是稳定

的。但未来可能存在变数。香港的 GDP 刚刚恢复到 1997 年的水平，并且由于老龄化和相对其他中国城市的高成本，其增长不会很快。我猜测香港不久就需要大规模地改进公屋质量，以保持社会稳定。

中国如何控制房价

中国内地与以上三种模式都相去甚远。在快速城市化中，如果仅一个城市提供廉价、高质量、易购买的公有住宅，那么转眼间就会被来自其他地方的移民填满。廉价的公有住宅可能很难获得。因此，政府提供公有住宅只能说是一项社会政策，而不是城市化的加速剂。绝大多数城镇居民都需要从市场上购买住房。在这一点上，中国更像美国，而不是那些东亚城市国家。

因此，保持市场房价在可承受范围内，是长期内满足住房需求的关键。有了便宜的土地和汽车，美国可以依靠市场提供廉价住宅。中国两者都没有。不过，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必须依靠公共交通去上班。所以，控制房价的第一要务，就是发展公共交通。这听起来可能不合常理，因为便利的公共交通会提高附近的地价。但是，拥有好的公交系统可以使平均地价下降。

公共交通系统耗资巨大。在美国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各个城市可以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随着城市的发展，税收收入增加，这些债券得以偿还。这样的良性循环在城市的成长阶段是可能的。中国的大城市也有条件产生这种良性循环。这就是我认为中国应该允许一批城市为发展基础设施发行债券的原因所在。

控制房价的第二个方面，是中国必须鼓励房地产业向工厂模式转型。当房价快速上涨时，该城市的政府应当迅速增加土地供给。当然，这种模式成功与否，要看当地政府给房价降温的决心有多大。如果地方政府依赖卖地收入满足资金需求，他们降低房价的措施就很难有诚意。如果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地方政府稳定房价的政策可能永远只会停留在口头上。

为了激励地方政府从长远利益着想，中国应当考虑开征 1% ~ 2% 的房产税 (property tax)。此项收入可以用作基础设施建设债券的偿债担保。债券的规模可以达到此项税收的 10 ~ 20 倍，这就足以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

第三，中国需要成立一个特殊的住房贷款机构以帮助低收入家庭。比如美国的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 (Fannie Mae)，就是美国政府资助的一个专业公

司，它从商业银行手中购买按揭债权，并将其资产证券化。因为享受到政府的保护，其融资成本非常低，这样节约下来的成本可以转化为购房者的收益。这种收益只能由按揭在一定规模内的借款人享受，以保证福利分配给中低收入家庭。

总之，中国应当集中资源建设 25 ~ 30 个超大城市，以完成城市化进程。这些城市应当享有发行债券的权利，来满足发展基础设施的融资需要。这些城市的房地产业应完成从土地银行模式向工厂模式的转型。地方政府应当依靠征收房产税而不是卖地来担保他们的债券。这样的城市化战略将让住宅的价格更易承受（例如 5 ~ 8 倍于家庭年收入），而城市中也充满就业机会。

谢国忠

独立经济学家

（原载《财经》2007 年第 14 期）

代序二

再论扶贫性金融

2004 年我提出了“扶贫性金融”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弱势群体的融资”。实践的发展与丰富，需要我们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的理性认识。

扶贫性金融的理论基础

一般说来理论基础是确立事物存在的机理，主要是回答某一事物为什么，因什么产生和发展。要阐明扶贫性金融为什么，因什么产生和发展，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金融的实际出发进行理性探讨。

1. 金融系统具有分配，再分配功能，在分配机制中既讲求效率，又注重公平，是扶贫性金融的根本理论基础。这些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基尼系数在 0.45 以上，达到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拉大有各种原因，但回顾改革开放的进程和一些发家致富人的历史，不可否认金融在拉大收入差距中发挥了加速器作用。现在的问题是：金融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中怎么定位？有何作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承认金融系统（包括银行）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分配、再分配的功能，即金融活动也是一种分配机制。国民收入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资产；同

理，一国的资源也经分配、再分配形成各部门的资产。金融系统在其活动中既有对国民收入、社会资源的分配，也有对国民收入、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比如利息收支是对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而存贷款是对金融资源的再分配等。现阶段多数人的共识是：初次分配要着力讲效率，再分配要着力讲公平，这样的理念也反映在金融领域中：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习惯上认为金融总是“嫌贫爱富”，其行为总是“锦上添花”而不会“雪中送炭”。其实，这只是商业性金融领域银行家的经营理念之一，而不能概括一切金融活动。有的金融活动不以盈利为目的，如互助性金融，在国外甚至把金融活动作为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之一，比如美国《公务员信贷联盟》对公务员发放优惠贷款；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们通常把商业银行定性为经营货币资金的金融企业，其实，这只是商业银行展业的一个方面，（当然也是重要的方面），当代，商业银行不仅经营货币资金，而且经营风险，经营风险实质上是通过金融创新帮助社会化解、转移、消除可能带来的损失，而自己从中获得一定的手续费；在经营管理中，金融企业家们通常讲要注重效率，其实除注重效率外，也讲求公平，实行优惠的货币信贷政策，加强金融监管等，就包含着公平，实现着公平。

2. 金融必须把闲置的货币收入转化为现实的货币收入，是扶贫性金融的又一理论基础。这些年来，我国货币供给量也持续高速度增长，1997~2004年 m_2 平均增幅 13.6%，2004 年 m_2 货币供给量比 1997 年增加了 1.79 倍，绝对额达 25.4 万亿元人民币。在 25.4 万亿的货币供给量中货币（ m_1 即流通中现金加活期存款）占 37.76%，准货币（ $m_2 - m_1$ ）占 62.24%。这种状况表明约有 2/3 的货币没有直接构成支付手段和购买手段，整体货币的流通性弱，货币供给量的流通速度趋慢。这种状况在金融系统的反映是几乎所有的银行类金融机构都是存款大于贷款，呈现出巨额的存差。巨额存差表明银行类金融机构中长期负债占比增大、负担增加，同时表明社会货币构成的变化：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在社会货币总量中有作为收入的货币和有作为资金的货币，作为收入的货币成为政府、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及家庭等消费单位的支付手段和购买手段，作用于消费；作为资金的货币成为企业等生产流转单位的支付手段和购买手段，作用于生产流转。我国银行存款连年大幅度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富人货币收入增加。富人货币收入大幅增加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在投资领域受限的条件下，货币收入就难以转化为货币资金，而作为货币收入被闲置起

来。在这种条件下，给金融系统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贫富差额拉大，投资领域受限货币收入难以转化为货币资金的条件下，要不要将潜在的货币收入转化为现实的货币收入，将闲置的货币收入转化为消费的货币收入？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决定于需求，消费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当代，银行业展业的趋向是着力扩展家庭金融，因为家庭是消费的社会基本单位。着力扩展家庭金融不仅因为富裕阶层的形成需要金融机构提供多功能服务、多种产品可供选择，而且因为中产阶层的形成，需要金融机构提供负债消费，需要理财融资。负债消费是超前消费，也是创新消费，而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说当代银行业展业的趋向是扩展家庭金融，则弱势群体，必须纳入，因为他们不仅同样需要金融机构提供多功能服务，而且也需要负债消费，通过负债消费形成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是创新的动力和资源。这种状况表明：金融不仅是调剂资金金融，也不只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同时具有将闲置的货币收入转化为现实的货币收入，使之成为购买手段、支付手段作用于消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3. 风险补偿是扶贫性金融再一理论基础。从经济学的角度说金融是以货币和有价证券为载体的经济交易行为，假定交易的供给方是资金盈余者，交易的需求方是资金短缺者，通过银行中介机构进行交易把货币资金供给资金短缺者，则银行中介机构面临着可能的金融风险。可能的金融风险会不会成为现实的金融风险取决于资金短缺者货币收支的确定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短缺者既有强势群体，也有弱势群体，由于影响货币收支不确定性的因素多，他们的货币收支都具有不确定性。作为金融机构在展业的选择上，如何看待和面对他们货币收支的不确定性，是至关重要的。一般说来，强势群体，对付货币收支不确定性的能力强，因为他们有较多的现实的资产和储蓄。但不能简单地认为弱势群体没有较多的现实资产和储蓄，而肯定他们对付货币收支不确定性的能力就弱。因为，货币收支的不确定性是对未来的货币收支的预期，尽管弱势群体现实弱，但不排斥他们未来会强。现实与未来的相互转化，弱与强的相互转化，是金融机构看待和面对社会成员货币收支不确定性的辩证逻辑，金融应在这样的逻辑中发挥作用。再说，货币收支的不确定性会带来风险，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的价值之一，就是为社会成员淡化风险，避免、转移风险是淡化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必须指出补偿风险，也是淡化风险的题中之意。金融

机构从事补偿风险在保险业中体现得很充分，但在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的今天，其他金融机构也具有补偿风险的功能。也就是说，即使弱势群体难以归还借款，也可视为对他们的风险补偿。弱势群体面临着诸多的风险即不确定性、金融机构为他们淡化风险，减少不确定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4. 在“信用面前人人平等”是扶贫性金融终极的理论基础。从法学的角度说，金融是以货币和有价证券的权利与义务为载体的交换，是权利与义务的制衡。权利与义务的交换要能成立取决于当事者的信用。信用是权利与义务的制衡。应当说作为社会的人都是具有信用素质的，“人无信不立，事无信不成”。在国内学术界的讨论中，有人曾引用古人的两句话“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无信用”（笔者也引用过）来佐证信用制度的建设必须建立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明晰产权有利于信用制度的建立是无疑的，但这样的佐证会使人产生误解；似乎只有有产者才讲信用？其实，这是对古人的这句话的片面理解。据我国古籍中的记载，孟子曾说过：“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在这一段话中没有“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样的典句，更无“无恒心者无信用”的表述，相反，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可见引用古人的两句话来佐证信用制度的建立必须建立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完全是引者对孟子这一段话的理解和引申。但这样的理解和引申是不全面的。按笔者现在的理解：这一段话是孟子为齐宣王献上的“治国方略”，其关键词为“恒产”、“恒心”、“明君制民之产”、“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所谓“恒产”即固定的财产，其引申的含义是权利；所谓“恒心”，即应具有的道德准则，其引申的含义是义务；所谓“明君制民之产”，即英明的君主主要让老百姓拥有维持生计所需的足够的财产量，其引申的含义是要让他们拥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能力；所谓“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意思是只要老百姓享有应有的权利，履行应尽的义务，则要他们服从你们的统治就容易了。所以，按作者的理解，孟子对齐宣王献上的“治国方略”就是要求得“恒产”与“恒心”的互动，用现代的语言表述，就是要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制衡。只不过在孟子看来这种互动只有那些拥有

知识的人才能做到（惟士为能）。这样理解孟子的这段话是想说明：不能认为只有有产者才讲信用，无产者就不讲信用。同时想表明：只要讲求“权利与义务”的制衡，信用观念就能建立，信用制度就能健全。金融的法理基础是信用，金融活动是建立在社会人信用素质的基础上的，只要加强教育让人们拥有知识，人们都会讲信用，不论他们是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

总之，金融具有分配再分配功能，必须将闲置的货币收入转化为现实的货币收入，进行风险补偿，求得权利与义务的制衡，在信用面前人人平等，组成扶贫性金融的理论体系。

扶贫性金融的制度安排

通常说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作为“社会游戏规则”，自然要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发生约束。讨论扶贫性金融制度的安排，需要认识：我国的扶贫受到什么因素约束；扶贫性金融需求的构成；扶贫性金融供给的建立，以及金融改革的方向。

1. 消除贫富差距需要财政与金融的配合。现阶段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在收入差距拉大的条件下存在着大量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关心扶持的，但不可否认现阶段对他们的关心、扶持不够。这主要是受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是政府财力有限；二是企业家（特别是富豪企业家）社会回报缺位。政府财力有限能够以相对人口众多，开销很大财政负担很重去解释，但在我国扶贫的财力有限与“财政支出偏好”有关。多少年来，我国政府财政支出主要是保政府投资，经济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比重一直较大，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是较小部分，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在我国，1998年的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占到38%，2003年下降到30%，但仍然是财政支出中的大项。加上不断上升的行政事业费（约21%）支出，则财政支出中一半以上与社会福利建设和扶贫不直接相关。而当代，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主要形式，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3到1/2。

当代，缩小贫富差距要靠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如果说第一次分配要着力讲效率，第二次分配要着力讲公平，则第三次分配要着力讲善心。简单地讲善心也就是把自己财产的一部分捐赠出来，关心、扶持贫困人们和弱势群